

相隔九年的国际盛会

——第六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实

丹青

近日，葡萄城吐鲁番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各族人民怀着喜悦的心情，庆祝2023新疆丝绸之路葡萄节暨第二十九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第六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同期召开。研讨会以“新时代吐鲁番学传承与发展”为主题，旨在彰显吐鲁番考古新发现以及国内外专家在吐鲁番学领域取得的新成就，探讨新时代吐鲁番学传承与发展的研究视角，不断提升和完善吐鲁番学学科体系，进一步促进吐鲁番学蓬勃发展，持续扩大吐鲁番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这次相隔九年召开的吐鲁番学国际盛会，不仅推进了文化润疆，还挖掘、弘扬了中华文化。会议召开前不久，吐鲁番博物馆和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联合举办了“吐鲁番考古第一人——纪念黄文弼诞辰130周年特展”。展览鲜活生动地展现出近一个世纪前的1927年，由中外学者共同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首次踏上新疆这片热土，开始了历时八年平等合作的科考历程，在历史、地理、气象、民族、考古、古生物研究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为中国学术界积累了协同创新、走向世界的经验。同时在另一个展厅，“考古扬自信，火洲显华章——吐鲁番近年来文物考古新发现特展”热烈推出，年轻的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龙先生，怀着虔诚之心讲述考古故事，令众人感动不已。正如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女士在特展仪式的致辞中所言：“新疆地处亚洲腹地，数千年来，多民族聚居融合，创造了璀璨优秀的文化，孕育了举世瞩目的丝路瑰宝，流传着无数充满传奇的历史故事，见证着多民族文化交往交融的辉煌历史，印证了各族人民世代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念。”中国的吐鲁番学是敦煌学的“姊妹学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彩一枝，绚烂一脉，是讲好中国新疆故事的生动素材，是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

研讨会期间，来自国内外众多知名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带来一份份用汗水和勤奋换来的吐鲁番学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每一位学者的交流论文，无不凸显中国吐鲁番学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力。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刘文锁，英国剑桥大学博士艾默瑞克·亨特分别发表《“吐鲁番文书总目”的编纂与展望》《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考古发现》《叙利亚文手稿中的西旁景教寺院》等主旨报告。来自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以及我国40多所大学、20多个研究或展示机构的140余名国内外专家学者与会。

在三个分会场上，与会学者围绕吐鲁番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中的地位与贡献，吐鲁番出土历史、宗教、语言文字资料所体现的中华文明元素，中华文化视野下的吐鲁番与多元融汇的丝路文明等展开热烈的讨论。历史考古分会场，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蒋洪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石窟寺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夏立栋，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教授王冀青，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刘学堂，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山部能宜，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哈巴雅尔，分别做《高昌回鹘西旁景教寺院人群的植物资源利用》《2023年度新疆吐峪沟石窟考古发掘成果与初步研究》《斯坦因吐鲁番柏孜克里克佛洞考古日记整理研究报告》《洋海与苏贝希》《再论吐峪沟石窟的意义》《蒙古国东部发现的回鹘时期古城研究》专题报告。出土文献组分会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许建平、中国台湾南华大学文学系教授郑阿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董永强，依次以《唐代西域官寺及其功能》《阿斯塔那27号墓出土景龙、开元两《论语》写本的关系》《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流传的蒙古文书》《乡里秩序中的地方大族——唐西州的张氏》为题进行讨论。在语言、宗教与艺术组分会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张总做《高昌与龟兹的地狱轮回及十王图像等》报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林丽娟做《亚里士多德在吐鲁番：论西旁景教修道院遗址出土叙利亚语哲学残篇》报告，中国香港新亚研究所佛学中心副研究员区佩仪做《高昌弥勒信仰形态——小乘禅观到大乘净土》报告。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重镇，几千年来，因商贸交流、文明交流、文化交融，吐鲁番留存有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吐鲁番学由此产生。为发扬光大吐鲁番学事业，赓续传承国家“冷门绝学”，在推动新时代文物事业蓬勃发展、拓展文物考古研究阐释，点亮文化传承发展之路上，吐鲁番市委市政府不遗余力。但荣新江也公正地指出：“不能不承认，敦煌学成果要比吐鲁番学多得多，吐鲁番学研究人员有限，有些工作无法展开，所以我曾经在2009年时撰文，《期盼“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比翼齐飞》，特别强调在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在吐鲁番地域社会史、写本时代书籍史、丝绸之路胡语文献等方面，应当吸收敦煌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加大力度做吐鲁番学的研究。”

上百年来，在黄文弼、季羨林等前辈先贤呕心沥血的努力下，经过世界各国诸多领域学者的探索研究，吐鲁番学已经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国际显学”，成为开展学术研究的资源富矿。荣新江希望吐鲁番市大力支持吐鲁番学，每年召开吐鲁番学发展战略研讨会，共同推进吐鲁番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向下生长的交河故城

胡振奔

交河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作为一座完全废弃的古代城市遗址，是我国及中亚地区同类遗址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城市标本之一。自从废弃以后，六百多年以来无人居住，因而这座城市遗址的整体格局没有遭到破坏。

交河故城与中原同时代古城，在营造方法上又有很大不同。它是利用高出地面30多米的台地，建造成一座供人们生活居住的城市。它本身经历了多个时代的修建，仅一个交河故城就使用了三种建筑方式：一是“夯筑法”，二是“压地起凸法”，三是“版筑泥法”。这三种建筑方式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可谓相得益彰。简而言之，夯筑法主要是在建筑区的地面高低起伏时，通过此方法可以将坑洼不平的地面填平，这是进行建筑施工中常用的方法，这类建筑方式在交河故城少数建筑中使用。“压地起凸法”是交河故城建筑的基本方法，这种建筑方法其实就是在修整过的平整的地面上，设计规划出居住室、门、墙和采光通风口(功能相当于现代的窗户)，然后用减地的方法按照先前的规划设计从生土中掏挖建成。这种方法仅适用于较小的建筑，但有时候为增加墙体或建筑的高度，还需要使用“版筑泥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关于“版筑泥法”的相关事实，在史书《史记·股本纪》中有记载。史书中曾经提到“傅说”一人，傅说是古代虞国(今山西省平陆县)人，我国殷商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及建筑科学家。他辅佐殷商高宗武丁安邦治国，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武丁中兴”的辉煌盛世，他落难时所创造的“版筑”(俗称打墙)营造技术，是我国建筑科学史上的巨大成就，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巨大进步。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交河故城的版筑泥法实际上就是商朝傅说的“版筑”建筑风格的继承和发展。

虽然我们并不能严格地说什么时代运用了什么样的建造方式，但它们有一个大致界定的范围，并且各种建筑方式之间有掺杂、有主次。在交河台地上，最为主要的建筑方式当然就是“压地起凸法”和“版筑泥法”。这也是交河故城建筑中使用较多的方式。这些建筑特点反映在实际的建筑中便是一进交河故城，映入眼帘的那些栉比鳞次的城墙和高低起伏的佛塔。这些都是这几类建筑方式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如今看到的这座故城更多还是保留着“压地起凸法”和“版筑泥法”的特点。这两种建筑方式也是交河故城所独有的。目前国内还没有找到能与交河这两种方式基本对应的案例。所以，交河故城是一座独具浓郁地域特色的城市建筑，是一座向下生长的城市。

交河故城，从汉代开通西域以来为人们所知，开始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一直到14世纪末毁灭于战火。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从最早的车师前国的都城，到汉代的交河郡，再到高昌王国时期的交河郡，唐代的安西都护府及西州下属的交河县，在高昌回鹘时期一度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和军事重镇。这期间，政治地位或许有所变化，但它一直是一座政治、军事、宗教中心。所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对于交河台地的开发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很有规划的，考虑了多种因素。纵然已废弃六百多年，然而它的形制布局在今天依然能够分辨出来。交河故城大体奠基于魏氏时期，形成于唐代(618—907)，其众多的建筑遗存基本上按功能、性质分为崖壁、城门、街道、官署、民居、防卫

设施、佛教建筑、水井、墓葬等，遗存主要以夯土遗存为主要表现形式。

交河故城由主干道分割成大片区，以巷道、环路围成了小片区，按照地势走向及功能进行区划。这样的综合城市布局基本完整，城门、城墙、主要道路、街巷和重要居住建筑、寺院建筑基址、水井等遗存至今清晰可辨。

交河故城的总体布局沿着两条大道展开，有计划地安排居民区、手工业区、商业区、宗教建筑、官署区等。居民区大都采用中央大道与两侧横向街道垂直相交划分成若干街区做法，同时具备防御功能，即整个城市包含居民区在内部具备复杂而严密的防御设施。它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城市规划以功能分区、以政治首府为核心进行建设，同时又以通向宗教建筑物的道路为中轴对称进行建设。

交河故城在古建筑学上的特点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城市布局规划合理，建造工程技术独特，以城市南北主干道、次干道及东西向支路、巷路来区划功能分区及处理城市所处狭长台地大尺度空间。这些在我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较为罕见。另外，交河故城的营建布局受到了中原城市建设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城市的中轴线处理、以主次干道为主要界标进行城市功能区划、多中心有分有合处理狭长大尺度空间的手法、“择中立街”、高墙院落落的配置、城市内广布佛寺并占据城市诸制高点的特点等，这些都能在北魏都城洛阳、唐代长安城等的形制布局发展轨迹中找到相应的依据。

古代文明一般都是向上发展，层层累积叠压的。旧的文明、旧的城市毁灭了，新的文明、新的城市就在旧文明、旧城市的“废墟”上发展。而交河城正好相反，它所体现的是旧的城市在最上层，越新的、时代越晚的城市建筑越在下层。它不是用砖瓦木泥浆建造起来的，它是在黄土台地上由一代一代的居住者一寸一寸地挖出来的一座城市。可能最初的几代人挖掘而成的是最上层的一些建筑，几百年以后，或者因为这些建筑破坏坍塌不能继续使用，或者人口增加等其他原因，又有人向下进行挖掘，因而形成了时代比较晚的一层建筑。再过几百年，又有人又向下挖掘，所以，时代越晚的建筑就越出现在底下。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考古出土物品的上下顺序，无法理解这座城市的“反常性”。

交河台地高出地面三十多米，其两边即是洪水和强烈的风冲刷，吹蚀而形成的两条宽约两百米的沟。人们选择居住在交河台地上是考虑到了它的天然防御性，四周陡峭的断崖是交河城的天然屏障，如果在上面搭建房子，势必会被北吹来的风掀翻，也不利于保暖，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用“压地起凸法”的建筑工艺从地面往下挖建，这样既适应了所处的地理位置，又可以节省工料，不必要从周围往来运建筑材料，向下挖土，直接从地面下取出土来，可以用来修建地面上的的一部分建筑，而地下的建筑既可防风沙又可保暖。

交河故城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和建筑遗存的独特性，使其成为我国乃至中亚地区的重要的人文和自然景观资源。一座向下被不断挖掘出来的城市，在毁灭以后，其形制布局依然清晰可见，成了地球上完美的废墟。

(作者单位：吐鲁番学研究院)



明铁质花马池厂称盐秤砣
宁夏盐池县博物馆收藏



汉食盐 宁夏盐池县
张家场汉代墓葬发掘

"盐"之苗苗

张雨潇

近年来，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食盐，一夜之间成为大众争相抢购的热门食品，茶卡盐湖等产盐地也紧急发出我国储盐充沛的公告。据介绍，其目前的储量够全国人民食用700余年，并且是“可再生”资源，全国各地也迅速广而告之，中国内陆盐产量丰富，民众大可不必为盐焦虑。

我国产出的食盐，可分作“海、池、井、土、崖(石盐)、砂石”等六种，这在明朝著名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就有记载。比《天工开物》还早的记录，如《尚书·禹贡》载：“海、岱惟青州……海滨广斥。……厥贡盐、希，海物为错。”说的是先秦时期青州产的海盐。又如《华阳国志》《蜀志》载：“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又识察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记录的是先秦时期蜀地的井盐，再如《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提到大夏之池盐。《凉州异物志》载：“盐山二岳，三色为质。”记录了凉州的盐山。诸如此载，中国古籍中的产盐记录不胜枚举，特别是汉朝以来，食盐的记录逐渐增多，并且开始设置盐官专管，例如《汉书·地理志》载安定郡三水县(治所在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镇北红城水古城)有盐官，应为宁夏最早的食盐开采记录。

从古籍中可知，自秦汉开始，除海盐外，我国民众主要食用池盐，位于山西运城的解池盐湖即为一处主要产地，传说虞舜曾用自制的五弦琴，弹唱《南风诗歌》：“南风三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温兮！南风三兮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可见池盐不仅满足了虞舜部落食用，还能带来财富。虞舜咏歌的就是山西运城的盐池，汉代称安邑盐池，又称河东盐池。《说文解字》第十二篇上释“鹽”字：“鹽，河东盐池，袤五十里，广七里，周六十里。从盐省，古声。”《后汉书》卷三《章帝纪》载：元和三年八月，汉章帝“幸安邑，观盐池”。可见汉代对于安邑盐池开采的重视程度。据《中国古代食盐产地分布和变迁研究》，汉代池盐产地分布于河东、巨鹿、渔阳、陇西、金城、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雁门十二郡和左冯翊、西域都护府，书中记录汉代池盐可统计的就有13郡18县，另有西域都护府蒲昌海，共有19处池盐产地，还有一些有盐官记录但没有记载是否有盐池的，但这些都位于北部内陆地区，可见汉代储盐充沛。



陕甘宁边区时期产盐区晒盐场景 盐池县革命历史纪念馆资料图



宁夏镇花马池营大盐池、狗池图 选自《陕西四镇图》



1937年8月23日《新中华报》报道《大家到盐池驮盐去》宁夏档案馆收藏

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池盐丰富，这得益于远古时期的自然地理环境。2005年4月至2006年11月，考古专家们在宁夏灵武市发掘出包括恐龙头骨、牙齿、肩胛骨化石在内的8只恐龙个体。灵武恐龙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属梁龙类中一个罕见的分支——叉背龙类，为中生代中侏罗纪大型新蜥脚类食草恐龙，距今约1.6亿年；1973年出土于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板桥乡的黄河古象化石，距今约200—250万年；1986年在宁夏盐池县麻黄山黄羊岭出土的古象化石、鹿角化石等，距今3万多年，由此可以想象远古时期，西北地区遍布湖泊、河流与茂密的森林，生存着大量体积庞大、逐水草为生的远古古象。大约在6500万年前，地球发生了一次大变化，印度板块不断地抬升亚欧板块，使得青藏高原上升并带动宁夏等西北地区的地势上升，形成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原来的湖泊因蒸发量大、降水量少，水资源开始匮乏，加之许多山峦迭起，原本汇流的湖泊变为内流或封闭的水系，水源变为地下水或周围山区的雨水，其营养物质含量较高，导致湖水通常呈现咸度较高的状态。这些“死水”缺乏足够的河流输送沉积物，逐渐由淡水湖变为咸水湖，且富集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盐类物质，如岩盐、硝酸盐、碳酸盐等。待干旱程度加剧，池盐便从咸水湖中晒干析出，遇到雨水，“死水”增多，沉积物继续堆积，再遇干旱析出，周而复始，盐池由此诞生，循环至今。可以说，只要地球不发生大变化，这些形成的池盐将不受时间和开采限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以宁夏的盐池为例，《元和郡县图志》之《关内道四》载灵州怀远：“县有盐池三所。降。红桃盐池，盐色似桃花，在县西三百二十里。武平盐池，在县西北十二里。河池盐池，在县东北一百四十里。”《太平寰宇记》之《关西道十二·灵州》载废怀远县：“本汉富平县地，周建德三年迁二万户于此置郡及县，并名怀远。隋开皇三年罢郡，而县额不改，复隶灵州。县有盐池三所，隋废。”可见，南北朝时期，宁夏地区食盐已近规模化开采。《新唐书》之《地理一》载威州温池县(治所在今宁夏盐池县惠安堡镇)：“本隶灵州，神龙元年置，大中四年来属，有盐池。”《唐会要》之《盐铁使》载温池：“置榷税使一员，退官两员，巡官

两员，胥吏三十九人，防池官健及池户百六十五户。”至唐朝，宁夏地区池盐开采不仅规模化，并且朝廷专采生产规模加大，已达标高的制度化管。随着朝代不断更迭，盐池权属不断变化，但无论是五代十国，还是宋元两代，宁夏的盐池一直在生产，并且被视为战略资源。1038年，李元昊建国称帝，宋夏战争正式爆发。随后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战役中，宋军连败，被迫和谈。和谈中，李元昊得寸进尺，要求北宋每年从西夏进口青、白盐十万斛，盐产量可见一斑。

1368年，明朝建立，社会秩序逐步安定，经济贸易得到恢复和发展，盐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此历史时期，宁夏属陕西都指挥使司宁夏卫所(有前卫、中卫、后卫、左屯卫、右屯卫)，成为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战区，同样也是“互市”贸易区。《明一统志》卷37载宁夏卫(今宁夏银川市)山川：“盐池有二，大盐池在卫城北四(百)十里，小盐池在围城东南二百七十里。其盐不假人力，自然凝结。”《读史方舆纪要》卷62《陕西十一》载宁夏后卫：“花马池，在卫城西。旧属庆阳府，去府城五百里。周围二十六里。又有石沟池在其西、莲花池在其东，相近者又有东小池与马槽等池，俱产盐、硝。”从史书看，仅宁夏后卫就有10个盐池，盐产量剧增，除给朝廷作为“贡品”上献外，主要由当地官商在民间以盐易物。据说花马池池名，就是由“以盐换马”的换马池音译而来，于是花马池池字开始有了行政建制。自花马池哨马营始，军事重要性持续增强，进而不断扩大建制，历代成为花马池营、花马池守御千户所直至宁夏后卫。明政府实行“盐马交易”政策，用花马池盐经三边输运延绥，用于在各大边镇换取战马，“盐马古道”“蒙汉互市”“骡马大会”日益繁盛。正統三年(1438)，宁夏总兵官史昭以“边军缺马，而延庆、平凉官军民多养马，乃奏请纳马中盐”得到了朝廷的批准，直接促使盐产量大幅度增加。宁夏的纳马中盐，主要在宁夏后卫，即花马池一带。以马换盐者，缴上等马1匹，售给盐60引，中等马1匹，售给50引，后升为上等马可换100引，中等马可换80引，直至弘治九年(1496)，改为盐商交银钱，

由官兵自行买马。无论何种交易政策，其前提自然是池盐生产的足够多。

直至民国二年(1913)，“花马池分州”干脆因大小盐湖20余处命名为“盐池县”，沿用至今。陕甘宁边区时期，盐池县一带产盐之多，甚至被评价为定、盐是边区的经济中心，定、盐失，边区则失去了西北门户。定指陕西省定边县，盐指宁夏盐池县，都是三边分区产盐的大户。1937年8月23日，《新中华报》报道《大家到盐池驮盐去——中央国民经部通知》：“现在盐池已打下数万驮盐，各级国民经部及合作社应速发动广大群众及社员前去驮运，以发展边区经济，改善群众生活。”1944年3月《陕甘宁边区产盐工作》中记录，1941年部队数千人去盐池生产，纠正了过去靠天下雨产盐的思想，提出来与自然作斗争的口号，在苟池、老池、滥泥池、莲花池、滩池、娃池、湾湾池、散包池筑盐田2834块，并组织灌水小组变工，缩短成盐和打盐时间，增加打盐次数，极大地增加了产量，将“打盐大生产”干出了“抢盐大生产”的气势。据统计，1938年至1942年，五年时间里，边区军民打盐126.3万驮，合约12.5亿公斤，极大地支援了边区经济建设，支援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至今日，这些功勋盐池仍然可以产盐，且盐田之美，不再是单纯的物质资源之美，大部分已成为工业发展之美、旅游观光之美，早已超出生存满足，转化为精神给养。

时光飞逝，物是人非，但盐湖仍然随着风的洗礼，发出凿凿之声。有史可循的盐业发展充分证明了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即使不再用海盐，还有池、井、土、崖(石盐)、砂石盐资源可供选择，民众尽可食盐之味，赏盐池之风景。“抢盐潮”已过，留给我们的绝对不是一个“闹剧”的谈资，而是人类对于自然资源依赖的反思。即使生活在科技进步的现代，没有了自然的馈赠，我们依然无法生存。试想，人类无节制的掠夺与污染自然环境，失去了海盐之味美，尚有池、井、土、崖(石盐)、砂石盐补充，若不亡羊补牢，继续污染、破坏与失去，又当如何？

(作者单位：盐池县博物馆)